

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出版和傳播

張 允 侯

中国人真正認識和接受馬克思列宁主义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但在二十世紀初資產階級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有一部分因反对清朝政府而被迫逃亡到日本和欧洲去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于受到工人階級解放运动的影响而接触到社会主义。他們在当时出版的某些刊物上，曾发表过一些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片断譯文。馬克思的名字最早見于梁启超的著作里。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十八号上发表的《进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一文中曾經提到：“麦喀士，日耳曼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也。”在第四十二、四十三号合刊上，他又在《二十世紀之巨灵托辣斯》一文中写道：“麦喀士，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述甚多。”麦喀士就是馬克思最初的中譯名。1906年1月出版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第二号，刊载了蟄伸（即朱执信）所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傳》，其中介紹了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拉薩尔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并节譯了《宣言》中的几个片段和十項綱領，就現在所知，这是在中国最早見到的有关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譯文，其后，1907年6月在日本創刊的中文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上也譯載了一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在1907年12月出版的第十三、十四期合刊上《女子革命与經濟革命》一文的后面，譯載了《共产党宣言》中对于資產階級婚姻制度的批判的一节；1908年1月出版的《天义报》第十五期上譯載了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作的序言；在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期合刊上又譯載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并在“女子問題研究”栏里刊载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章《家庭》中的几段譯文。1912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社会党紹兴支部的刊物《新世界》上，也曾刊载过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譯文。如从第一期起到第七期止，以《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为题，連載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的一、二两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第

二期《社会主义大家馬儿克之學說》一文里，除刊载《共产党宣言》的十項綱領的全譯文外，还对該书的内容、馬克思生平和他的剩余价值學說作了簡介。

但是，由于譯者們的非无產階級立場和对社会主义缺乏正确的認識，因此在这些譯文和論述中有着不少錯誤。例如，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傳》一文里，作者就用資產階級的观点批評了馬克思关于資本积累的學說，认为資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并不是用掠夺和暴力来实现的。又如《天义报》的編輯在《女子革命与經濟革命》一文之后，虽然援引了《共产党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資產階級“公妻制”的論点，但他們的着眼点却是从无政府主义的角度去接受和利用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論点，而决不等于完全贊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无產階級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張。这一点从該文的按語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天义报》的編輯和撰譯者們还錯誤地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国会主义看作是馬克思与无政府党首領巴枯宁分裂以后的路綫，把社会主义运动的叛徒海德曼說成是“确守馬氏、因氏之學派者”，这就充分表明了他們对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无知。再如，《新世界》的譯文中，錯誤之处是很多的，就拿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部分譯文来看，其中有不少是非常严重的錯誤。这是因为譯者限于自己的外文知識，很多地方不懂原文，于是就按照自己的观点任意加以解釋，甚至借題發揮，这就必然要歪曲原文的思想。例如，原著第一节的一段，本来是对十九、二十世紀空想社会主义的总结性批判，在譯文中却变成了歌颂。譯文写道：“总而言之，理想社会主义者，实十九世紀最高尚、最精密、馳騁宇宙之一大主張，而益浸淫澎湃、奔放浩蕩于二十世紀及二十世紀以后之世界也，及至今日，英法社会主义家无一不頂礼崇拜，且毕想研究此理想社会主义。”这样譯者就无法解釋为什么后来又出現了“实行社会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来代替它，只好說这是因为后来的学者不了解理想社会

主义，把它解釋錯了，才不得不由“实行社会主义”来加以糾正。按照这种說法，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就看不出了。类似的例子是很多的。因此，这样的譯文很难起真正傳播科学社会主义和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用。此外，在上述这些刊物中，虽然譯載过一些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但它們更多地譯載的却是那些宣傳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讲坛社会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的作品，这就弄得“泥沙俱下，魚龙混杂”，使当时的讀者目迷五色、莫宗其是。至于当时各地出版的、打着宣傳社会主义招牌的中国社会党的刊物，事实上更是在做着无耻的投机生意。以江亢虎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党的党徒們，根本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也不了解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区别，以至他們所介紹的社会主义学說，只是一堆折衷主义的杂糅。这些投机分子的唯一目的，就是想把馬克思主义当做一种海外奇談，用来兜攬政治資本而已。由此可見，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是没有条件了解馬克思列宁主义的。

到了1917年以后，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思想界才真正出現了社会主义的思潮。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工人階級的成長，則为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傳播創造了必要的条件。1918年冬，中国共产党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在北京組織了“馬客士主义研究会”，團結了一些进步青年学生，学习和討論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問題。1919年5月，在他的主持下，《新青年》六卷五号作为《馬克思主义专号》出版了。在这个专号里，李大釗发表了《我的馬克思主义观》一文，簡要地介紹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观、階級斗争和經濟学說，同时他还在《晨报》上开辟了“馬克思研究”专栏，宣傳馬克思主义思想。这就对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傳播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深入发展，人們更加迫切地要求了解馬克思主义，于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陸續地被介紹到中国来。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評論》第十六号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譯文，5月，北京《晨报》的“馬克思研究”专栏里連載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序言中論述历史唯物主义部分（見5月5日——8日該報所載《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該文作者日本河上肇引用了上述部分）和《雇佣劳动与資本》的譯文

（5月9日——6月1日連載，标题是《劳动与資本》），11月出版的《国民》杂志二卷一号上也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在共产主义小組成立前夕，1920年4月在上海出版了陈望道譯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个中文全譯本（未譯序言），出版后很快就脫銷了，这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分子学习馬克思主义的热烈情况。

1920年5月，各地共产主义小組相繼成立，从此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傳播就較前进了一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国民》、《建設》、《东方杂志》等刊物上所刊載的以及单独发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資本論自叙》、《反杜林論》（部分譯文）、《政治經濟学批判》一书序言（部分譯文）、《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部分譯文）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譯文，恽代英譯，載《东方杂志》十七卷，十九、二十期）等。此外，陈望道譯的《共产党宣言》于1920年9月在上海又再版了一次。

这一时期在各地报刊上刊載的以及单独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譯文，就目前已發現的計算，共有七种（一篇著作的不同譯文以一種計）。同时在一些进步的和影响較大的重要报刊上（如《新青年》、《每周評論》、《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星期評論》等），也不断地刊載介紹馬克思学說和他的生平事业的文章。闡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介紹馬克思主义的譯著，如考茨基的《馬克思資本論解說》、《階級斗争》（恽代英譯）；馬尔西的《馬克思資本論入門》、《馬克思經濟学說》（李达譯）；克卡朴的《社会主义史》等，也在各地出版。上述这些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譯文以及有关譯著和文章，对当时的进步青年学习和了解馬克思主义都起了促进的作用，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創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这里特別值得提到的是，当时毛澤东同志在长沙創办的文化书社和恽代英同志在武昌創办的利群书社在傳播馬克思主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这两个书社曾大力推銷上面所提到的书刊。尤其是文化书社，我們从它的两次《社务报告》和《銷售目录》中得知，像《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馬克斯資本論入門》、《馬克思經濟学說》、《社会主义史》和《階級斗争》等书，該社均有代售，并且极为暢銷。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后，馬克思主

义理論开始有系統地介紹到中国来，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譯文無論是种数或印数都較前增加了。据統計，从党成立到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結束，仅新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中譯本即达十种之多，至于介紹和闡述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文章就更多了。

1921年8月間，毛澤东同志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学，并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出版了理論性的杂志《新时代》月刊(共出四期)。在該刊創刊号上，刊载了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的全譯文，标题是《德国劳动党綱領栏外批評》。同时連續刊登了好几篇介紹馬克思主义理論和唯物主义的文章，对于宣傳馬克思主义、帮助干部提高理論水平，都起了重大作用。

1921年9月1日，党在帝国主义和軍閥統治下的上海成立了地下的“人民出版社”。为了避免反动当局的迫害，在出版的书刊上都印上“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字样。該社从成立到1922年9月一年里，共出版了《馬克思全书》三种，这就是：《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資本》(新譯本)和《資本論入門》。在1924年以前，国内各地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譯本还有：《工資、价格和利潤》、《哥达綱領批判》(另一种譯本)、《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一、四、五、九各章。

1922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在上海創刊，接着，《新青年》也改为党的理論刊物，移到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繼續出版。这些刊物以及党和团所主办的其他刊物——《先驅》、《少年》、《青年周刊》、《前鋒》等，都刊登了許多宣傳馬克思主义和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事业的文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馬克思主义的傳播。此外，在各地进步报刊上登載的这类文章和有关資料也日益增多，甚而在一些并非进步以至反动的刊物上，也把刊載这类文章当作推广銷路和兜攬政治資本的手段。例如，当时由北京政府議員、投机政客胡鄂公所主办的刊物《今日》，就曾譯載过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并專門出版过一期《馬克斯特号》(一卷四号)。这充分反映了广大讀者渴望学习馬克思主义的心情。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人民紀念馬克思的活动也广泛展开了。1922年5月5日馬克思誕生一〇四周年，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在上海举行了紀念会，除在会上介紹了馬克思的生平和事业外，还專門編

印了《馬克思紀念冊》。紀念冊包括三篇文章。第一篇是《馬克思誕生一〇四周年紀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第二篇是德国著名的无产階級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撰写的《馬克思傳》的譯文；第三篇是《馬克思學說》。在北京，由李大釗所倡導，而以早期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邓中夏、黃日葵、高君宇、何孟雄为骨干，于1921年組織起来的“北京大学馬克斯學說研究会”，也在这天举行了隆重的紀念大会。会上李大釗还发表了講話。同时，北京的《晨报副刊》也出版了《馬克思紀念专号》，刊载了四篇介紹馬克思生平、革命活动及其學說的文章。同年3月14日(馬克思逝世的日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员会召开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大会。出席这次大会的团员和来宾共三千多人。会上确定以“研究馬克思主义，实行社会改造”为宗旨。青年团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青年周刊》还发表了紀念馬克思的专文。

1923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机关报《先驅》第十七期发表了《馬克思誕生一百零五周年紀念日敬告中国青年》的文章，文中指出“馬克思主义是无产階級革命的唯一指导原理”，“是推翻資本主义解放无产階級的唯一武器”，并号召中国广大青年要坚定地站在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和帝国主义、軍閥統治展开搏斗。此时远在巴黎的留法勤工儉学学生中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也在它出版的内部刊物《少年》第九号上发表了《馬克思——共产主义的創造者》的紀念文章。在这一期的封面上还印着《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話。該刊在同年7月出版的第十号上又刊载了馬克思两篇著作的譯文：《法兰西內战》(部分譯文，标题是《历史要走到无产階級专政》)和《政治上漠不关心》(1873年作于倫敦，标题是《离开政治的性质》)。封面也仿照第九期的形式，印有恩格斯《論权威》中的一段譯文。在这一时期，中国人民以紀念偉大革命导师的形式，广泛地展开了馬克思主义的宣傳。

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導下，中国革命中的各民主階級結成了統一戰綫，从这时起中国革命开始走向高潮。为了使中国工人階級和广大人民深入了解党在統一戰綫中的策略原則，党的北方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第十四期(1924年8月24日出版)以《民主革命与工人》为题，譯載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

同盟书》的片断，譯文前面还加了編者按語，其中写道：“……这篇演說与《共产党宣言》同一重要，所言方法在六十余年为俄国布尔什維克所采用，已經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至于我們今日譯此演說的意思是在：（一）希望工人階級明白了解对国民革命的责任，不要盲从中等階級的主張；（二）揭发中产階級易与旧統治階級妥协的性质，使中国平民注意监督民主主义者，不要背棄了他們的利益。”

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給马克思主义的傳播造成了有利条件。1924年以后出版的馬克思著作中譯文有：《哥达綱領批判》、《中国的和欧洲的革命》、《法兰西内战》（部分譯文）、《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階級斗争》一书的第一章和《共产主义原理》等。

同时，各地报刊上介紹馬克思主义的文章就更多了。除《新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晨报副刊》等繼續扩大馬克思主义的宣傳外，还有不少新出版的党刊、团刊和进步刊物，如：《政治生活》、《人民周刊》、《中国青年》、《少年先鋒》、《赤心評論》、《新学生》、《紅灯》、《香港学生》、《岭东民国日报》副刊《革命》等也都刊载了許多闡述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了帮助广大进步青年学习馬克思的学說，《中国青年》还在二十四期上发表了一个学习馬克思学說的书目，并对每一本书作了簡要的介绍。书目中所包括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資本》、《工資、价格和利潤》等。这个书目还把《新青年》（季刊）、《前鋒》、《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五种期刊列为学习和研究馬克思学說的参考讀物。虽然当时出版了不少这类书刊，但《向导》周刊編輯部却还接連收到要求大量介绍和刊载馬克思主义著作的来信，这就說明中国人民那时对馬克思主义理論的需要是极为迫切的。

这几年，全国各地进步刊物在紀念馬克思誕辰时发表的宣傳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較前大大地增加了。如1924年5月上海的进步刊物《孤星》第八期上发表了《五五紀念与馬克思》的专文。1925年5月《中国青年》出版了《五月第一周特刊》，其中刊载了任弼时同志为紀念馬克思誕辰而撰写的《馬克思主义概略》一文。任弼时同志在該文里系統地闡述了馬克思的学說，并号召中国的革命青年要“用馬克思的宇宙观去研究一切問題，处理一切問題”。《政治生活》也发表了紀念性的社論，着重指出“在国民

革命运动中的中国无产阶级，尤不可忘馬克思主义之原理”。同时，宁波的青年团机关刊物《火曜》也出版了《五月第一周特刊》，发表了紀念馬克思誕辰的专文。广州革命刊物《新学生》还发表了紀念和学习馬克思的两篇专論。1926年5月，《向导》周刊发表了瞿秋白同志撰写的紀念馬克思的文章，题为《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馬克思主义》；《香港学生》也出版了《革命之五月特号》，刊载了劍英所写的《馬克斯与中国革命》一文。1927年5月，南昌革命刊物《紅灯》出版了《紅色的五月专号》，在题为《今年紅色五月的新意义》的专論中指出：“我們不但要了解馬克斯主义，接受馬克斯主义，而主要是在行动上，在一切战斗中貫徹与运用馬克斯主义，这便是我們紀念‘五四’的新的深刻的意义”。同时，湖南省立高級中學校也出版了紀念馬克思誕辰的《紅色五月》专刊。以上这些只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至于当时出版的自然还不止此，但从这些材料中，已經完全可以了解当时中国人民对紀念和学习馬克思及其学說的重視了。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自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結束，無論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譯文种数，或是宣傳和介紹馬克思主义的文章，都較党成立前增加了。这說明了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在傳播馬克思主义方面所作的巨大努力。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利用了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方法扩大馬克思主义經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工作。十年中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就現在所知，計有四十一種，其中包括《哲学的貧困》、《从猿到人》、《費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資本論》（第一卷）、《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政治經濟学批判》、《反杜林論》、《德国农民战争》、《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重要著作。有些著作还有两三种甚至四种不同的譯本。例如，从1930年到1934年，《資本論》（第一卷）的譯本就有四种之多。同时上海等地还出版过两种馬克思著作选集：《社会主义的基础》、《馬克思論文选譯第一集》，以及一些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在內的专题合集，如：《辯证法經典》、《黑格尔哲学批判》、《恩格斯等論文学》、《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論》、《社会进化的铁則》等。

这一时期，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的出版是

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区，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围剿”，他们接二连三地发布“禁书目录”，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一概被列为禁书，翻译和出版这类书籍经常要受到疯狂的迫害，因此往往要加上各种各样的伪装来作掩护。例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译本上，著者的署名不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而用卡尔、嘉尔、因斯，或在封面上根本不印作者的名字。有时则将书名改头换面，如1928年8月上海出版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改名为《社会发展史纲》，著者译名为“因斯”；《共产党宣言》的译本也时而改称《宣言》或《马克思、恩格斯宣言》。党的地下进步出版机构为了免遭封闭，也经常改换名称。例如党在上海的出版机构“无产阶级书店”被查封后，成立了“华兴书店”。当华兴书店的出版物亦遭查禁时，就改名为“启阳书店”继续出版。后又更名为“春阳书店”。1931年党在保定成立的地下出版机构“北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也常常在封面、扉页和版权页上印有“人民书店”、“北国书社”、“新生书社”、“新光书店”等出版的字样。译者也使用笔名或假名。此外，这一时期出版的党和团的地下机关刊物，也经常用伪装封面作掩护，坚持发行。如当时党的理论性指导刊物《布尔塞维克》就采用过“少女怀春”、“中央半月刊”、“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中国文化史”、“金贵银贱之研究”、“经济月刊”、“虹”等八九种伪装封面；1929年出版的《党的生活》，伪装封面是“南寿仙翁”；193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创办的《宣传者》也采用了假封面，上面印有“演说术”三字，下角则有“上海广益书局印行”的字样；1931年3月9日在上海创刊的党的另一个机关刊物《红旗周报》采用的伪装名称有十余种之多，如：“快乐之神”、“实莱周报”、“时时周报”、“平民”、“光明之路”、“大众文艺”、“佛学研究”、“机联会刊”、“现代生活”、“真理”、“新生活”、“摩登周报”、“经济统计”、“出版界”等；这时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河北省机关刊物《北方红旗》也采用过假封面；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采用的假名则有：“美满姻缘”、“何典”、“列强在华经济政治的势力及其外交政策”、“青年杂志”、“青年半月刊”等。

上述这些党刊和团刊以及在同一时期出版的其他地下党团刊物，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都起了重

要的作用。其中如党在1928年11月20日创办的最早一种《红旗》杂志，还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而出版过《反托洛斯基主义特号》。前几年笔者在一个偶然的会里，从天津旧书店购到一本重要的北方地下党刊——《出路》第一期，这是一个三十二开本的小型刊物，1928年10月20日创刊。其中载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的全译文。由于当时白色恐怖所造成的印刷条件的困难，该刊印数很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再发现。据一些革命前辈的回忆，它只出了一期就因环境的恶劣而被迫停刊。但通过这个刊物也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也是始终一贯地坚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的。

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当然与白区完全不同，这里虽然纸张和印刷条件都非常困难，但仍想出种种办法，用土纸、油印、石印或木板来印刷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当时在瑞金出版的一批《共产党宣言》就是用木板印刷的。此外，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斗争》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青年实话》，都非常注意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经典著作。如在已经发现的《斗争》第六十八期上，就刊载了马克思为1853年6月14日出版的《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社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以及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这两篇著作的全译文。

1937年7月，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抗日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力展开了提高党员思想水平的工作。这时经典著作的出版中心已转移到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这就为有系统地大量翻译和出版这类书籍创造了较过去大为有利的条件。党在延安的出版机构“解放社”，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1938年起，以《马克思丛书》的形式陆续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到1942年共出了十种，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克思通讯选集》、《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恩格斯论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阶级斗争》。解放社在1937年还专门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一书，同年该书曾于上海再版，改名为《中国问题评论集》。这时延安的其他出版机构翻译和出版的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著作还有：《馬克思恩格斯对于唯物史观的书信》、《英国工人运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入門》等。此外，一些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在內的专题合集，如：《論共产党》、《論馬恩列斯》、《論弱小民族》等，也同时在延安出版。

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一直关怀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的翻譯和出版工作。1943年中央还根据毛澤东同志的提議作出了《关于翻譯工作的决定》，并成立了專門翻譯和校閱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的机构。

为了使抗日战争迅速获得胜利，党在当时曾号召广大干部仔細研究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战争的理論。延安“八路军軍政杂志社”为此專門編輯和出版了《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其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論著有：《恩格斯軍事論文选集》（第一册），《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普法战争》（本书包括恩格斯在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間所写的六十篇軍事論文）和《馬克思列宁主义論战争与軍隊》等。

同时，在国民党統治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区，党的地下組織和先进人士也排除种种困难，重印了延安出版的一些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譯本，并翻譯和出版了《唯物辯证法》、《費爾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工資价格和利潤》、《法兰西內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資本論通信集》、《德意志意識形态》、《德国的农民革命》等。这里特別值得提到的是，1938年上海出版了馬克思的巨著《資本論》的全譯本。这个全譯本的出現，大大帮助了广大讀者对馬克思主义的經濟理論的学习。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胜利发展和各解放区的扩大，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經典著作的出版量逐日增加，同时一些重要著作都有了較好的譯本，这就有力地促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傳播。根据不完全的統計，在抗日战争时期，全国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約有三十种。

在1942年整風运动中，党为了帮助同志們掌握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以便更好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曾編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論》一书，作为全党的必讀文件之一。通过这个規模巨大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运动，使全党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这就为抗日战争和继之而来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創造了极其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9月），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經典著作的出版工作主要是在广大解放区的城市进行的，因而印刷的数量大大增多。如当时各地新华书店发行的《共产党宣言》，就有七种不同版本。在国民党統治区空前殘酷的白色恐怖下，党的地下出版机构和革命的出版工作者仍想尽一切办法来出版和傳播这类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期間，全国各地新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致顾格曼博士书信集》、《从猿到人》、《新哲学手册》、《剩余价值学說史》、《哲学底貧困》、《共产主义原理》等六种。

1949年初，党中央为了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論水平，以便迎接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內的胜利，規定了十二种“干部必讀”的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讀物，其中收入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包括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內的合集：《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

据初步統計，从十月革命以后到1949年9月底止，三十年間，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共翻譯和出版了九十四种。到全国解放前夕，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已經基本上都有了中譯本。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这鮮明地标志着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偉大胜利。《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經驗》一文指出：“工人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之下贏得革命，贏得国家政权，而革命的胜利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又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开拓无限广阔的道路。”事实正是如此。中国人民的胜利，为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的出版和傳播創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党和政府极端重視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工作。在解放后的最初年代里，全国各大城市出版了許多馬克思列宁主义經典著作，以滿足广大讀者学习的迫切需要。

为了有計劃、有系統地翻譯馬列主义經典著作，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1953年2月成立了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該局依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并参考原著文字，現在已翻譯和出版了其中的一至十三卷、十五卷和十七卷。同时，該局翻譯的馬克思、恩格斯著作单行本和专题言論集还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主义原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态》、《法兰西內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反对机会主义》、《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不断革命》等。此外，还編譯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人在生产中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等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了国家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十三年来，該社除陸續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外，还出版了許多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中譯本。只《共产党宣言》一书就印了十六次之多，其中如1953年出版的《資本論》、1957—58年以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四卷本《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58年重印的《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以及許多重要著作的单行本，都給讀者們的学习以很大的方便。此外人民出版社和全国各地許多其它出版机构、国家机关、学校、研究部門、企业部門等还編譯和出版了許多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作家的专题言論集。据不完全统计，关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就有五十多种（包括兼收其他經典作家言論的合集在內）。重要的如：《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馬克思恩格斯論馬爾薩斯》、《馬克思恩格斯論工会》、《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与共产主义》、《馬克思恩格斯論浪漫主义》、《馬克思恩格斯論文学》、《馬克思恩格斯論艺术》、《馬克思恩格斯論报刊》、《馬克思恩格斯論国家和法》、《馬克思恩格斯論殖民主义》、《馬克思恩格斯論西班牙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軍事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人口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經濟危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国际貿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妇女解放》、《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反对教条主义》、《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基础和上层建筑》、《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无产階級政党》、《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作家論邏輯》、《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語言》等。还有些专题言論集，是專門結合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出版的。例如，为了使全国人民能够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建設社会主义，各地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技术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水利》、《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交通運輸》、《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提高劳动生产率》、《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生产关系》等；为了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加强經濟核算，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財政貿易》、《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貨幣、信用与銀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工資》等，为了宣傳和貫徹“教育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結合”的方針，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論教育》、《馬克思列寧主义經典作家論教育与生产相結合》、《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教育方針》、《馬克思列寧主义論思想改造》等；为了使广大干部更深入了解有关共产主义的理論，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产主义社会》。此外，为了配合若干中心学习，还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不断革命》、《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人在生产中的作用》、《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无产階級革命》、《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无产階級专政》和《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等书。1961年，为了紀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同年10月，在历史科学方面，人民出版社編輯部还編輯了《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历史科学》和《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历史人物评价問題》两书，这是史学界长期以来所需要的讀物，因此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此外，該社在1962年10月还出版了刘瀟然等譯、編譯局校的《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

1957年在党的领导下展开了全民范围的整風运动。这是继1942年全党范围的整風运动以后的一次更大規模的馬克思列寧主义教育。通过这次整風运动和反对资产階級右派的斗争，空前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觉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設的高潮。为了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从理論上巩固这次整風教育的成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社会主义教育課程的閱讀文件汇编》。在这个汇编中收入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针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問題、肃反問題、农业合作化問題、知識分子改造問題、少数民族問題，以及文学与艺术問題等发表的文章和言論。

总计从1949年10月到1961年底这十二年間，用汉文出版的馬克思著作共二十二种，1,346,000册，恩格斯著作共三十一種，2,468,000册，馬克思恩格斯合著和专题汇编共三十八种，2,465,000册。用各种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共十四种，52,000册。当然，上面这些数字到目前为止又該进一步刷新了。由此可见，解放以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出版事业正在迅速地发展着。由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全部譯成中文，即有了譯文的，也須进一步提高譯文质量和大量再版重印，因此，經典著作的譯者和出版者們还要为此不断做出巨大的努力。